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财产、法律与政府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著



F03-57
2013/

阅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财产、法律与政府

——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著

秋风译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产、法律与政府/(法)巴斯夏(Bastiat, F.)著;姚中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658-5

I. ①财… II. ①巴… ②姚… III. 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41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财产、法律与政府

——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著

姚中秋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58-5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30.00 元

Frédéric Bastiat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本书根据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1 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 5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 2012 年出版至 5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 月

目 录

前 言	F. A. 哈耶克 1
第 一 章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5
第 二 章 法律	68
第 三 章 财产权与法律	140
第 四 章 正义与博爱	163
第 五 章 国家	193
第 六 章 财产权与掠夺	207
第 七 章 贸易保护主义与共产主义	258
第 八 章 掠夺与法律	299
第 九 章 学位与社会主义	315
第 十 章 反对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战争宣言	383
第十一章 关于压制产业工会的讲话	391
第十二章 致民主人士	409
第十三章 贸易差额	414
第十四章 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	419
翻译说明	425

前 言

F. A. 哈耶克

即使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想为他的一般性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5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之际的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的事实，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按说这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的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

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持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那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而只有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却有益的行动,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绝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

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时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诸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清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的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惟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时,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站在他一边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最新版上

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加以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100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

第一章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①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① 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时,处于无知之中,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时,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①。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导师。为此,我将研究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 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②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

① 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② 在法语中 Jacques Bonhomme 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 6 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 6 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 6 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 6 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 6 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 6 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 6 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 6 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 6 个

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就业”,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①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②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

① 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② Auguste, Vicomte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 *Nouvel essai sur la ri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

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场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现在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老百姓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2. 军队复员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

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入侵。”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裁撤十万人！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搞到收入？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失业现象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等着想干？难道你想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十万人，又有什么好？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啊。想想你的那种想法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

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 A 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 A 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已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